

魏晋南北朝

城市管理研究

任重

陈仪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任重 陈仪◎著

# 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任重, 陈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04-4079-0

I . 魏… II . ①任… ②陈… III . 城市管理-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F2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9382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炳 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23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1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言

## 一 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古代城市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所以历来为史学家、地理学家所重视。自两汉时成书的《史记》、《汉书》、《周礼·考工记》及《管子》起，两千余年来记述、研究城市的史官、学者可谓代不乏人。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长安志》、《三辅黄图》、《历代帝王宅京记》、《两京新记》、《汴京遗迹志》、《宋东京考》、《咸淳临安志》、《帝京景物录》、《唐两京城坊考》、《景定建康志》、《汉口丛谈》等，皆为专门以城市为著录对象之史籍。其他有关城市的历史地理学文献更不在少数。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形态的长期停滞，进入近代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且被扭曲；同时，也由于学科的分化和整合形成的内在规律的制约，从浑然一体的史学中分离出城市史的专史，需要有漫长的认识上的提升，因此我国古代没有出现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sup>①</sup>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研究首先是从考古发掘开始的。1928年，以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开始了对安阳殷墟进行试掘。这是中国考古学上首次用现代方法发掘早期城市遗址。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古，拉开了古城市研究的序幕。若粗略爬梳，则20世纪50—70年代，是田野工作大规模进行与初步研究阶段。其成果是对早期城址的布局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70

---

<sup>①</sup>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进入了对城市各种遗迹间及城与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阶段，诸如城市的起源、早期城市的形制布局、性质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并逐渐成为涉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此，古代城市研究与城市考古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初，便潜心于古代城市的研究。经过长期的钻研，于 50 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开城市理论研究之先河。他的关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和社会学的兴起，都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阎文儒先生通过对洛阳汉唐城址进行勘查，在其《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的论文中，围绕“汉魏洛阳城里数的确定”、“金墉城与洛阳小城位置的确定”、“北魏宫城在洛阳城的正中”、“太学灵台和白马寺”、“汉魏洛阳城的建筑方法和一般的建筑材料”以及“殷人和殷以前居民的遗迹”等一系列问题，就洛阳在汉唐间的形制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80 年代以后，古代城市研究步步深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先后有《中国古代都城概况》(李洁萍)、《中国六大古都》(陈桥驿)、《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古都篇》(刘德岑)、《中国都城发展史》(叶晓军)、《中华都城要览》(丘菊贤等)、《十大古都》(赵永复)、《六朝园林》(吴功正)、《中国城市史纲》(何一民)、《中国城市发展史》(宗越敏等)、《汉代城市研究》(周长山) 等专著面世。这些成果均出于从事历史、地理、考古、经济、城市建设、古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其中《汉代城市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秦汉城市的著作，除了对于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汉代城市的分布、汉代城市的城郭以及长安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之外，还对汉代居民的基本编制——里、汉代城市中的市场诸问题阐幽发微，尤见功力。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系统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念海和

杨宽两位先生。史念海先生在对周、秦、汉、唐等古都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和研究之后，于1983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古都学会，提出建立中国古都学会的设想和建议，至1988年已定出七大古都，同时列为历代重要古都的约60个，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近100个。史念海先生又写了《中国古都概说》，提出了“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的定义；1998年，史念海先生将十数年来有关研讨与保护古都文物风貌的论文，编为《中国古都与文化》专集出版，“藉以推动古都学研究和保护古都的迫切任务”。<sup>①</sup>《中国古都与文化》对于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古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种种、古都与文化以及古都的衰败、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诸问题创获颇夥。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则通过征引大量翔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道等城市建筑的格局及其衍变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揭开了笼罩于古代城市的神秘面纱。可以说，史念海和杨宽二位先生的出色工作使他们成为了我国古代城市研究中的执牛耳者。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无疑也同样称得上是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以历朝建筑的特点为核心，从建筑学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建筑风格的衍变、城市的发展、建筑材料、技术和工艺继承与创新，特别就历代城市主体建筑的结构、组群布局、艺术形象、园林建设等进行了解剖式、鞭辟入里的分析，图文并茂，蔚为大观。<sup>②</sup>

① 《中国古都和文化·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 此外，林立平先生的《封闭结构的终结》一书亦颇见趣味。其中，提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经过了“原始城市”、“结构封闭状”、“结构亚开放”、“结构开放”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整个部落制向国家过渡时期、先秦至唐初、唐中叶至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时期至当代，总的的趋势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完全是高屋建瓴，从城市结构研究出发，最后超越了城市本身，自然也超越了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研究。

要之,魏晋南北朝研究向来可圈可点,泰山北斗,不乏大家。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洛阳城市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sup>①</sup>这些成果的迭出,不仅奠定了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引向纵深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根据。虽然这些论著大多数都没有直接涉及城市,但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间接涉及,只不过诸家论述的角度不同,或从政治角度,或从经济角度,或从外交角度,或从宗教、文化角度,各循其长,每每有精辟的见解,发人深思。总体上看,关于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个案性质的成果比较多,如郭黎安先生的《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从“建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东吴时期的建业”、“东晋和南朝的建康城”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建业(康)的发展、衍变。徐光冀先生的《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对曹魏时期邺城的平面规划及其在中国古都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探讨。张金龙先生的《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就北魏洛阳的里坊制度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其他还有大量的论文探讨城市建置、城市里坊、城市工商业、城市考古,等等。皆就某一个具体城市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非常有意义,并且重要和不可或缺;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努力从整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城市的历史,视野仅局限于个别的城市,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们对城市总的发展规律的把握。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淘尽每一座矿藏。若干的城市为历史风化,我们也许永远也难以看到它们的真相了。因此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城市史的呼唤就变得现实和迫切起来。李凭先生的《北魏的平城时代》或多

<sup>①</sup> 举其荦荦大者,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汉唐外交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论》(黎虎)、《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六朝史论》(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朱大渭等)、《六朝经济史》(蒋福亚)、《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品位与职位》(阎步克),等。

或多或少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因为他曾以较重的篇幅就平城京畿的城市作过极有价值的考证;但从其主旨来看,这仍然是一部平城时代政治史的论著。应该指出,日人前田正名先生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译)是一部非同凡响的力作。它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方法,对4—5世纪的平城交通、生活方式、商业经济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手法独特,视角新颖,不啻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典范。另外,卢海鸣先生的《六朝都城》和金大珍(韩)学兄2002年12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颇可视为近几年出现的为数不多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最新成果,《六朝都城》以建康为研究对象,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风水因素三个方面详细剖析了建康能够持续成为六朝都城的原因。至为可贵的是,学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微观入手,分别就建康的规划建设、城郭、城堡军垒和郡县治所、礼制建筑、市政建设、市场、里坊、园林、寺观神庙、陵墓等10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新意迭出。《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洛阳城市风貌这一独特的视角为切入点,详尽地论述了北魏洛阳城时代的变迁,揭示了5世纪末—6世纪前期洛阳作为三大交汇点的重要功能。<sup>①</sup>

前田正名先生与卢海鸣先生、金大珍博士的研究无疑都是对魏晋南北朝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都从某个方面拓宽了城市研究的领域;但整体上它们依然是北魏平城、六朝建康和洛阳城市的个案研究。<sup>②</sup>

<sup>①</sup> 金大珍博士提出的所谓“三个交汇点”,即:民族融合的交汇点、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外交流的交汇点。参该作者博士学位论文(文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sup>②</sup> 此外,刘淑芬的《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则主要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六朝时期以建业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繁荣景象。日人渡边信一郎的《宫阙与园林》(载《考古学研究》47—2,2000),主要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宫城的空间配置作了探讨。

纵观历年来的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虽然收获颇丰，也不乏有影响的大家，但研究领域多集中于先秦、秦汉和唐宋以后。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研究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已有的个案性质研究也更多地关注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乃至社会生活等其他诸领域，全方位的城市研究尚未得以开展。因此，进行系统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稿拟以“城市管理”为题，试图举纲张目，通过观察本时期城市管理的机制及其在社会治安、居民管理、社会保障、市政管理等领域的具体运作，从宏观上解读和把握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的特征。同时，也尽可能就城市史中某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如城市居民的编制、城市的粮食供应、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生存方式等作出尝试性的回答。城市管理是城市史的核心问题。本稿以为，通过从宏观上把握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管理机制及运作模式，有关本时期城市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就比较容易把握；各类城市兴衰之玄机、城乡关系之真谛将浮出水面；城市的分布状况、城市的地位、城市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城市的文化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同样也会尘埃落定。果如此，则可使我们对于本时期城市史的研究大大前进一步。而这也正是本选题的意义之所在了。

## 二 研究的方法

当我们把视角挥向魏晋南北朝城市之时，发现其内容十分庞杂，个人学力所限，欲穷尽冰山之一角也是非常艰巨的，难以面面俱到。诚如皮明麻先生所说，城市史研究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人们的心理、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功能、疾病……”“而这些方方面面又相互联系、消长变化，每一个方面又可以成为一个母系统，延伸出许多

子系统”。<sup>①</sup> 魏晋南北朝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本稿希望主要从管理的角度入手，探讨城市的发展脉络。

城市管理的机制是研究城市管理的关键。与之相关的是管理机构和官吏。古代城市虽也有“市长”，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市长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政治上城乡一体化的传统模式，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又扮演着施政平台的角色，因此城市的最高管理者只能是一个行政区划的首脑级人物。秦汉以来的行政区划通常是以郡县制为代表的，一个郡或一个县有着与之相对应的行政区划，郡守或县令（长）便成了本郡或本县的“城市之长”。所以说到底城市的管理机构，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而城市管理的官吏与一地的行政官吏是同一套人马。虽然由于社会的种种变故会影响这种管理模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根本上看情况并未能因此而改变。换言之，如果当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被将军所取代时，那么该将军自然也就成为了该行政区划新的地方行政首脑。

我们愿意在这里作这样的强调，即：城市管理的机制，大多数情况下同时也是该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机制。当然作为“城市之长”的郡守（或者将军）在行使城市管理的职能之时，必然有与乡村管理、与军队管理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不是存在于管理制度，而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管理方式。比如，治安管理中有宵禁的制度，宵禁的制度既施行于城市，也施行于乡村。但在城市，需要通过城门的定时启闭等措施来进行。这自然是与没有城门的乡村判然有别的。

如果我们为了理顺管理机制的运作方式而面面俱到地仔细描述每一个机构，穷尽每一项律令实际操作之始末，非但由于必要史料的缺乏而陷入徒劳，也不利于说明问题，更有与城市割裂的危

<sup>①</sup>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险。这种偏离要旨的描述不是本稿的追求。我们除了将城市的管理机制摆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之外，更多的工作是观察这些机制是如何与城市相结合的，让城市管理的官吏进入城市相关领域，把相关的制度逐条实施。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城市管理中有多少最主要的问题，其中又有多少最能反映城市管理的制度和水平。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行文就可以大致做到有的放矢。

纳入我们视野的，首先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城市的起源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承认城市的起源与军事（防御）有关，就会发现后来的城市也在走着同样的路。而且至少要走到唐宋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与军事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大大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进程。而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了。其次，居民管理作为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里坊制度。本时期的里坊制度研究存在许多空白和无奈，这种空白和无奈造成了对于城乡关系体制研究的乏力，甚至于乡村概念的笼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里坊制度。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的里呢，以往关于里的经验和认识是否显得过于先入为主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就里的性质进行讨论的原因。浅见以为，里的出现曾经与军事有关，其发展脉络表明，它的这一方面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定下来了，只不过以军事编制的形式出现而已。再次，基于对本时期城市的特点和里坊制度的认识，我们尝试提出魏晋南北朝国家编户的生存方式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不敢苟同郡、县、乡、亭、里（村）的认知模式，限于本稿的任务，我们谨慎地、初步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因为，这不是一个从广义上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古代城市来说，治安、市政、市场、居住方式等等，是实施城市管理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始终存在于城市的内部，而且具有极强的外延性，它们在政治力量所能触及的任何地方被复制，所反映

出的问题因而往往更多。比如透过城市的治安状况，可以探测整个社会的治安状况。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又反映出政权是否稳定。须知，有的政策是针对和平时期的，有的政策则是针对动荡时期的。而这一切皆可从城市管理中找到答案。整体把握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管理机制及运作模式，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而魏晋南北朝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市政与市场的管理等等，属于城市管理的传统要素，与上述城市管理的其他要素（子系统）一起组成一个大系统，将这些要素层层展开，有助于我们进入城市管理的微观世界。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叙述的冗长和头绪繁多，对于其他某些与城市管理有关的问题，我们准备在另稿中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无关宏旨，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城市史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具体讨论中有所涉及时我们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将它们与全文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一些问题，从城市史的角度上看，举足轻重，是很值得认真展开的。当然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题目的任务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持续动荡的历史阶段，虽历经数世纪，但其城市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若干情况下，甚至可以看到秦汉制度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在叙述的同时对某些尚嫌模糊的故事作一些必要的考订，并藉以服务我们的主张。因为战乱，几多的城池或者可以被毁灭，或者兴而衰、衰而兴，但历史依然在发展，城市居民依然存在，所以城市管理也就不会中止。上述所及数种有关城市管理的对象，都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本稿将在充分掌握已有研究成果、吸收最新考古成果和利用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借鉴各种学科门类的有益经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通过展示魏晋南北朝城市治安、市政、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等重要项目运作方式，对魏晋南北朝独特社会背景下的城市管理作出系统的探讨。此乃本稿的基本思路。

# 目 录

引 言 .....	( 1 )
<b>第一章 中国 古代 城市 发展 概况 .....</b>	<b>( 1 )</b>
第一节 城市的概念 .....	( 1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变态 .....	( 18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城市居民的一般规模 .....	( 38 )
<b>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城市 管理 机制 .....</b>	<b>( 47 )</b>
第一节 京师管理机制 .....	( 48 )
第二节 地方城市管理机制 .....	( 67 )
第三节 城市事务官吏的监察与管理制度 .....	( 74 )
第四节 城市管理的特点 .....	( 83 )
<b>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城市 治安 管理 .....</b>	<b>( 89 )</b>
第一节 城市治安责任制 .....	( 89 )
第二节 城市治安法规 .....	( 93 )
<b>第四章 城市居民管理与魏晋南北朝城市 编户 社会 .....</b>	<b>( 106 )</b>
第一节 里与魏晋南北朝城市居民管理 .....	( 106 )
第二节 城乡融合的编户社会 .....	( 152 )
<b>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市场 管理 .....</b>	<b>( 178 )</b>
第一节 市场概况 .....	( 178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市场的管理 .....	( 194 )
<b>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市政 管理 .....</b>	<b>( 205 )</b>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城市规划与管理 .....	( 205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市政管理.....	(212)
<b>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粮食管理与社会保障.....</b>	<b>(229)</b>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粮食管理.....	(22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社会保障.....	(250)
后记.....	(271)

# 第一章

##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概况

### 第一节 城市的概念

#### 一 城市的起源与国家的萌芽

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中国城市发生的时间，大致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在三皇五帝时期。例如《汉书》卷 24《食货志》：“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中州杂俎·郡邑》引《轩辕本纪》：“黄帝筑邑，造五城。”其二，城市出现于鲧、禹时期。《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篇》：“夏鲧作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sup>①</sup>如此，则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然而三皇五帝时代在历史上究竟具体相当于何种时段，其社会发育程度究竟如何，史家各执一词，未有确说。但近年来伴随着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的展开，一批远古时期的城址陆续得到发掘、整理，为我们探索古代城市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料。与古文献相对照，城市起源应不迟于三皇五帝时期。迄今所知最早的城址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的巢湖流域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城市沿河而建，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

<sup>①</sup> 《太平御览》卷 192：“《博物志》曰：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禹始也。”

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城市“规划”的水平。其中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伴有大量陶片出土；第二区是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应该被视为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内还发现了供居民公用的水井，而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中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城的周围带有防御功能的大型围壕。据学者研究，该城在远古时期曾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sup>①</sup>河南新密境内发现了一座全国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城址——古城寨城址。这座古城距今约4100年，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位于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周围，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的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宽34—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从已清出的两座大型房基来看，建筑为南北长方形，南北长28.4米、宽13米，面阔七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这座古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考古专家们一致认为，此城址中生产工具较少，而酒具较多，说明城中居住的不是一般劳动者，应该是一处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sup>②</sup>

---

<sup>①</sup> 周剑虹、孙晓胜：《中国城市历史提前一千年》，《光明日报》2002年8月25日。

<sup>②</sup> 王阿敏、梁鹏：《河南新密发现4000多年前古城》，《光明日报》2000年6月28日。宋夏商文化研究，因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而取得重大进展。1999年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重要遗址又开展了考古工作，新

对于城市起源的契机，中外皆有若干不同的看法，其荦荦大者，一曰“防御说”，认为“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的”<sup>①</sup>。作为防御性建筑的主体，原始的城堡就是城市最早的起源。<sup>②</sup>既然文明时代到来伊始的城市是军事堡垒，那么可以认为城市是军事的产物。城市的发展也难以与军事斗争摆脱干系。这样的军事堡垒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城，其外在形式大体上是用土坯或石头筑就的墙垣。人们筑城，既是为了聚居，也是为了抵御其他部落或野兽的袭击。城市在此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城市只存在于最近的 5000 年中。一当出现了人口、手工业和商业以及财富的这种集中时，为了管理和保护这种集中，一般都在这种居民点的周边修筑起城墙。但有无防御性的围墙，并非城市的根本标志。”<sup>③</sup>二曰“集市说”。持此说者认为城市是在市集的基础上兴起的，民间交换或经济交往

发现了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和洹北商城。在偃师商城宫城内发现了我国最早王宫池苑遗存。在郑州商城宫殿区中心部位发现多处商代早期的夯土建筑址。这是目前在郑州商城宫殿区发现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址，为夏商分界研究增添了又一考古资料。焦作府城城址平面呈方形，面积约九万平方米，城内已发现多处夯土建筑址。洹北商城是继 1983 年发现偃师商城以来商文化研究中的又一重大发现。该城址位于安阳小屯东北、洹河北岸。城墙基槽尚存于地下，宽约 10 米，夯土厚约 1.3 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边长都在 2000 米以上，面积达 400 多万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商代城址，其年代早于武丁时期。该城址的发现及今后考古工作的深入，将为商代历史、尤其是商代中期文化研究开拓新的局面。参刘庆柱、朱乃诚：《1999 年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刊《光明日报》，2000 年 2 月 18 日。

①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

②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③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 年第 2 期。